

國立政治大學《史薈》第 58 期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2025)七月

評森部豐著，馬雲超譯，《何謂唐代：東歐亞帝國的興亡與轉型》

(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

歷史二 丁少威

本文評介日人森部豐著，馬雲超譯《何謂唐代：東歐亞帝國的興亡與轉型》一書。作者森部豐為日本歷史學者，善治唐史、五代史、東歐亞史等史域，研究領域關懷活動於歐亞大陸上的「粟特人群」，著有《粟特人在東方的活動和東歐亞世界的歷史性展開》、《安祿山——發動「安史之亂」的粟特人》等書。譯者馬雲超為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專攻中日關係史，曾譯多部作品，如《東洋的古代：從都市國家到秦漢帝國》、《隋唐世界帝國的形成》、《何謂明代：「危機」下的世界史與東亞》等書。

序章〈如何看待唐朝的歷史〉，作者提出「東歐亞帝國」的概念，將華北、北亞、東北亞、河西走廊、新疆、西藏等廣闊區域納入一個整體的歷史框架加以考察。作者依據學者妹尾達彥的劃分，將唐朝置於世界史第二期——「歐亞史的形成期」，因此特別關注其遊牧文化特質，並將唐朝理解為自

魏晉以來「遊牧文化」與「中國古典文化」融合的終點。唐朝一方面前承拓跋國家遺緒，另一方面又為往後征服王朝的濫觴，此種劃分方式恰與該時代的特徵相契合，而這正是作者撰寫本書的核心關懷，也呼應了副標「東歐亞帝國的興亡與轉型」的涵義。

本書第一章〈朝著東歐亞帝國飛翔〉覽觀唐朝建立前至太宗皇帝在位期間的時局。魏晉南北朝的南北方分庭抗禮最終於 589 年隋滅南朝陳而完成了形式上的一統。隋朝吸收了保存於南方的古典文化，與北方遊牧文化融合後創造了全新的局面。唐朝一方面標誌自己與前隋有異，但實際上卻很大地繼承其制度與政策。唐從最初的地方政權走向中央集權王朝，後邁向稱霸草原與東歐亞地區的「帝國」。本章中，作者除了關注七世紀中期以前唐政權與歐亞大陸內部人群的活動外，也聚焦於活躍於中亞與東歐亞地區的人群——粟特人與突厥等，指出唐朝不僅是內部互動，更是與外部粟特人和突厥等群體互動與碰撞，進而共同形塑了七世紀中期以前東歐亞地區的複雜性，也為唐朝的建立發揮了不小的影響。

第二章〈武周革命〉以武則天為中心，展開自高宗即位至武氏登臨朝堂舞臺的過程。在這段時期中，武則天藉由政治勢力與手腕、佛教保護等政策使其勢力穩固，而其中更有一幫支持武則天的「胡人」們，如阿羅憾等從旁協助。作者指出，高宗駕崩後不久，某個民族集團開始在記錄中出現，它不僅給唐朝的歷史，甚至給五代和宋初的政治史都帶來了重大的影響——「粟特系突厥」。7 世紀前期以來，唐朝對東歐亞世界的統治開始出現陰影，其契機就是突厥的獨立運動。雖然武則天在位期間粟特系突厥的人群並無太大改變與衝突，但突厥第二帝國等人群勢力的誕生也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唐朝日後的發展。

第三章〈轉換期〉將時間著眼於八世紀前期到中葉，即武氏逝世後至安史之亂前。武則天逝世後，武韋之禍終由玄宗結束，改元「先天」為「開元」。作者於本章中著墨於唐朝政治制度的改革，如玄宗朝的政治革新、括戶政策等，並提到此時有別於常規「府兵」的「節度使」誕生。與周邊互動上，作者提及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與井真成的事蹟，並藉由墓誌文補述了史籍所不及之處，反映了日本視角下的遣唐使。玄宗的統治逐漸將唐朝推上國力的頂峰——「開元之治」，而進入天寶時期則又是另一番氣象。朝堂上李林甫、高力士、楊國忠接連登場，後宮則有楊貴妃承蒙雨露，作者沒有陷入過往對楊貴妃「紅顏禍水」論述的泥淖，而是以簡單幾筆帶過。與此同時，蒙古地區的回鶻帝國誕生，草原上的革命引發了大規模的人群移動，突厥阿史那氏一族與跟從他們的突厥將軍一起向唐朝「亡命」。同時，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夕，唐帝國的邊陲與興起於西亞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在西突厥故地怛羅斯爆發衝突。最後兩方衝突雖暫告一段落，但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帶來了人員的流動，此後以安史之亂爆發為契機，人群向東翻越帕米爾高原，朝唐朝境內湧來。

正如學者仇鹿鳴在其書《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所指出，「安史之亂」前後的唐朝幾乎可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政體。¹過去傳統唐史往往較重於開國與盛世的面向，而森部豐本書則更著力於中晚唐的描寫與分析。

第四章〈帝國的變遷〉以「安史之亂」展開，立足於「東部歐亞大陸」的視野。作者認為安史之亂不僅是針對唐王朝的一場「叛亂」，更像是安祿山及其所屬政治集團試圖從唐朝獨立的過程。這場持續了八年的歷史事件，是唐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也是東歐亞世界變遷的重要標誌。作者認為，若從粟特人在歐亞大陸的活動與遷徙軌跡觀察，其勢力尋求獨立的作為，與突

¹ 仇鹿鳴，《長安與河北之間》（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2018），頁1-381。

厥、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在不斷變動的歐亞格局中與中原政權的競爭，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唐朝從一個高度集權的帝國，逐漸演變為藩鎮林立、權力分散的割裂局面。不僅動搖了唐朝的根基，更影響了東歐亞地區的政治格局和文化交流。同時，亦削弱了唐朝以中央帝國姿態向四方小國的輻射能力和影響力，成為改變國運的關鍵轉折點，使大唐由鼎盛走向衰落。

第五章〈王朝的轉型〉聚焦於九世紀前期到中葉，即安史之亂後唐朝內部的發展。順宗繼位，永貞革新，然而安史之亂後唐朝的帝國大廈已然根基不穩，一方面政治上藩鎮割據各地遍起，另一方面周邊政權與唐朝的互動轉惡，對於唐朝中央可謂是蠟燭兩頭燒。憲宗即位後，雖推行財政改革、平定藩鎮勢力等史稱「元和中興」的舉措，但作者指出憲宗因沉迷長生丹藥、情緒暴躁，後遭致宦官們暗殺，所謂「中興」也無疾而終。此外，本章中作者也提到中唐皇帝「遊手好閒」的一面，闡述此時皇帝喜食丹藥、追求長生的思想與舉措，將其理解為是對時局的「解藥」；而在政治上，朝堂的黨爭對立加劇；針對此時唐朝與周邊部族政權互動由於此時河朔三鎮的歸順和叛離，以及唐、吐蕃、回鶻三國的會盟，促使其在關係上發生轉變；在宗教上，唐朝的「崇佛」與「滅佛」，在不同皇帝在位間有不同政治功用，彈壓摩尼教、會昌滅佛等宗教事件，促使「排外思想」的抬頭。

過往提及唐末多側重以政治史「黃巢之亂」的書寫，然而第六章〈邁向新時代〉作者在關注戰爭與叛亂的同時，亦未忽視普通百姓的生活，並聚焦於九世紀後期到十世紀初期。在〈軍人和民眾的崛起〉一節中，詳盡探討唐末「裘甫之亂」的前因後果。歷經此事件後，唐末中央權威的衰落、地方藩鎮的割據以及基層民眾承受的沉重壓迫。森部豐認為，裘甫之亂不僅是農民反抗的展現，更是象徵唐朝社會結構的瓦解，預示著帝國的崩解。由此得見，叛亂、農民起義以及貴族與皇權之間的權力鬥爭，影響唐朝社會的各個階層。作者此種採取自上而下的歷史敘事方式，使社會變遷的複雜性呈現地

更加鮮明。

終章〈世界史中的「唐宋變革」〉作者援引森安孝夫的概念，指出人口較少的遊牧民族，憑藉騎兵軍事力量與貿易經濟實力，在草原世界站穩腳跟後，引入文書行政制度，並在農耕世界確立統治。而日本的東洋史學界一直以來將契丹國與女真族建立的金、蒙古族建立的元、滿族建立的清，統稱為「中國征服王朝」，作為中國的歷代王朝之一。但近年來的研究認為，應當以契丹國為首的這些征服王朝從中國史的框架中跳脫出來，把他們理解為時期劃分中第二期誕生於歐亞各地、直到蒙古帝國才得以完成的「中央歐亞型國家」才更加合理。

唐朝歷史常被置於中國史的框架內研究，特別是在「唐宋變革」視角下，將唐前期視為貴族制度發展與胡漢融合的過程，後期則強調與宋代以後的連續性。然而，僅依賴中國史的框架有失偏頗且難以全面理解唐朝。以「安史之亂」與「黃巢之亂」為例，前者與當時歐亞全境的流動密切相關，可視為國際性事件；而後者雖常被認為是國內動亂，但實際上後者亦影響了廣州的海上貿易，進而牽動伊斯蘭世界。足以反映從廣闊的歐亞視角考察唐朝的重要性。中央歐亞型國家的雛形可追溯至渤海國、回鶻帝國及安祿山勢力，後者殘餘勢力即維持半獨立狀態的河朔三鎮。傳統研究多將河朔三鎮視為唐宋變革的一環，然其影響遠超唐朝範疇。三鎮節度使多出身于奚、契丹、回鶻、粟特等族群，且需維繫多民族武人集團，遂建立有效行政體制，並吸納科舉待業者充任幕僚，探索農耕世界的統治方式。唐朝滅亡後，後唐與契丹承繼河朔三鎮的政治經驗，最終催生了中央歐亞型國家的興起。因此，唐朝的歷史意義之一，即為這些王朝的誕生奠定基礎，使中央歐亞型國家模式得以成型，並在蒙古帝國時期達至巔峰。

森部豐以「東部歐亞大陸」史觀建構對唐朝的歷史敘事，該觀點也是日本學界受「全球史」概念下所提出的史學理論，其中以日本學者森安孝夫極力倡導之。而在《何謂唐代：東歐亞帝國的興亡與轉型》書中提出的觀點亦與日本漢學界的既有研究相呼應，如杉山正明《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²、《大漠：遊牧民的世界史》³、森安孝夫《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⁴及氣賀澤保規《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⁵等書，皆是類似或相同的見解。以此種廣大縱深視角書寫的書籍，如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一書中，以「大歷史」、「長時段」的視角論述，依循政治史的脈絡闡述唐朝在中國歷史中的位置——「第二帝國」，承前啟後。⁶許倬雲《經緯華夏》則著眼於空間影響人群活動的「歷史地理學」，闡述粟特人群匯入唐代文化的「國際性」，即大區域性的文化轉變，著重於人群互動使唐朝文化更加豐富多元，在中原文化基礎之上又融入異邦色彩，進而影響此後朝代。⁷與森部豐不同的是，許氏認為這些突厥族群能夠征服中國，與其游牧方式有關，且其居住地相對固定並擁有鐵礦和鑄鐵技術。因此，突厥族群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與東方征服者的角色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就學術史脈絡上而言，本書雖與此二書無直接關聯，但卻有異曲同工之處，並綜合了二書所長。而最引人注意之處，乃是本書指出的粟特人在唐朝建立和後續政治中的活躍身影和積極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學界這方面研究的不足。

² 杉山正明著，郭清華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新北：臺灣商務印書，2017。

³ 杉山正明著，黃美蓉譯，《大漠：遊牧民的世界史》，新北：廣場出版，2018。

⁴ 森安孝夫著，張雅婷譯，《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新北：八旗文化，2018。

⁵ 氣賀澤保規著，郭清華譯，《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新北：臺灣商務印書，2017。

⁶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2019），頁139-165。

⁷ 許倬雲，《經緯華夏》（海口：南海出版，2023），頁123-141。

首先，以歷史學視角而言，本書跳脫以「中國」中心、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史觀論述，藉凝鍊的文字闡明唐政權與周邊族群互動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作者沒有陷入此前學者的窠臼，而是從廣闊的「東歐亞大陸」史觀來看唐朝，反思「中心影響邊緣」的傳統詮釋框架，觀點頗為新穎，且有見地。整體而言，本書仍然是依循政治史嬗變的脈絡陳述，從粟特人的遷徙、定居、建立勢力，參與並融入唐朝政治與軍事活動著手，並以此旁及其周邊北亞、東北亞、關中地區、河東地區乃至河西地區的互動變遷，因而得以突破唐朝與安史亂軍、中央與藩鎮、中原與北方等諸如此類的二元論述框架，剖析唐朝不同於既往朝代，能夠兼容並蓄、開放包容的側面，以及伴隨體制變遷經歷的歷史轉型。

其次，本書除了徵引相關古籍加以強化論述外，如《舊唐書》、《新唐書》與《資治通鑑》等史書材料，更將晚近日本學界對於唐朝史的研究成果適時援引進書中，如：池田溫、⁸妹尾達彥、⁹杉山正明等人提出的內容。¹⁰此外，針對古籍所不及備載之處，透過大量考古成果出土的墓誌、碑文相互比對，以「二重證據法」進行佐證與批判，進而使人物與時代的面貌更為清晰。通過豐富的史料和對粟特人群的深入研究，解釋了唐朝如何吸收多民族文化的精髓，並利用這些文化優勢建立了龐大的帝國，嘗試突破傳統的「唐宋變革論」和「征服王朝論」的藩籬，以更為包容的歷史理論框架詮釋，讓讀者得以從新的角度審視與思考唐朝的歷史地位。

⁸ 池田溫，日本東洋史學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中世史。著有《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亞文化交流史》、《唐令拾遺補》等。

⁹ 妹尾達彥，日本東洋史學者，中央大學文學部名譽教授。研究領域為隋唐時期中國都市與環境史，並致力於隨唐長安城研究，並以游牧世界和農耕世界的關係為核心，闡明歐亞大陸的歷史發展。著有《長安的都市計畫》、《隋唐長安與東亞比較都市史》等。

¹⁰ 杉山正明，日本歐亞史學者，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為蒙古史、中央歐亞史。著有《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等。

復次，本書最初面向的受眾為日語世界的讀者，然而事實上也適用於中文讀者的華人群體，後經譯為簡體中文，使讀者群變得更為廣闊。若以「知識普及」的視角，本書篇章結構明朗、論述條理清晰，並在書寫與敘事風格上兼具學術深度與可讀性。相對於其他學術專書，本書沒有陷入學術論述的框架，而是更好的詮釋日本學界所提出的成果，轉化為更為親民的方式將唐代歷史普及給一般民眾。於書末處，作者附註「文獻指南」供有興趣的讀者可按圖索驥、延伸與擴展相關文章作品，也讓讀者了解日本學界對於唐代及該時期民族集團的研究成果。而就行文與敘事上，本書的故事性敘述增強了其吸引力。森部豐並未止步於枯燥的歷史分析，而是透過對歷史人物的深入刻畫，將唐朝的輝煌燦爛、衝突與衰落轉化為一則則引人入勝的故事。這種敘事方式不僅拉近了歷史與讀者的距離，也使歷史的經驗與啟示更加直觀易懂。

最後，作者重新回溯、思考唐代。跳脫「中國」的包袱，以更廣大的視角切入，即「何謂唐代？」除了是本書作者所關懷的內容，更是時代之問，藉由歷史之問，在某種程度上引導讀者反思自身對「唐代」的認知，並挑戰歷史「應當如是」的既定敘述，進而思索「何以如是」的歷史因果關係。

徵引文獻

1. 仇鹿鳴，《長安與河北之間》，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2018。
2. 杉山正明著，郭清華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新北：臺灣商務印書，2017。
3. 杉山正明著，黃美蓉譯，《大漠：遊牧民的世界史》，新北：廣場出版，2018。
4. 氣賀澤保規著，郭清華譯，《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新北：臺灣商務印書，2017。
5. 許倬雲，《經緯華夏》，海口：南海出版，2023。
6. 森安孝夫著，張雅婷譯，《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新北：八旗文化，2018。
7.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2019。